

学术前沿研究

儒家文化传统与 中国电影民族品性的构成

尹晓丽◎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术前沿研究

辽宁省教育厅高校科技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儒家文化传统与 中国电影民族品性的构成

尹晓丽◎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儒家文化传统与中国电影民族品性的构成/尹晓丽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ISBN 978-7-303-11693-5

I. ①儒… II. ①尹… III. ①电影评论－中国
IV. ①J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6217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 mm × 235 mm

印 张：17.5

字 数：248 千字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策划编辑：陈佳宵 **责任编辑：**陈佳宵 王 强

美术编辑：毛 佳 **装帧设计：**天之赋

责任校对：李 茵 **责任印制：**李 喻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序

周斌

众所周知，电影之于中国是一种“舶来品”，但它传入中国以后的迅速发展，却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营养的汲取和对中国观众欣赏习惯的尊重。一百多年来，中国电影的成长和发展始终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由此呈现出独特的民族风格和东方美学风貌。因而，若要真正了解和认识中国电影，就一定要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对它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博大精深，而儒家文化则是其中的主流。在中国历史上，儒家通过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创造出了“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等文化价值体系。长期以来，儒家文化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它不仅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文化资源，而且其影响也波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因此，若要了解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首先，就要了解中国电影和儒家文化的关系。

就儒家文化和中国电影的关系而言，可谓影响颇大，渗透颇深。以“仁学”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在文艺上重视“文以载道”，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提倡“文质彬彬”的审美观，注重发挥文艺作品“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等。这种文艺思想对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影响非常之大。从积极的影响来看，其入世精神、忧患意识，重视电影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及对观众的教育作用等，对不少创作者的电影观念、艺术追求和美学风格的形成等，均产生了很大影响。

例如，在中国现代电影史上，郑正秋的影片就颇具代表性。他认为电影“最高者必须含有创造人生之能力，其次亦须含有改正社会之意义，其最小限度亦当含有批评社会之性质。”他的创作实践也具体体现了这种电影观念，从其最初的《难夫难妻》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嘲讽，到后期的

《姊妹花》对造成阶级压迫、贫富悬殊的黑暗社会制度的抨击，都鲜明地显示了这种艺术追求。

又如，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谢晋的影片也明显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精神。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电影导演，他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应该通过他的影片，对一些社会问题发言。”他曾说：“影片真正打动观众，最主要的在于它的真实性和思想深度。”所以他拍摄的影片往往注重开掘思想内涵，既表现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见解，也体现出他的救世情怀、忧患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是他在十年浩劫以后拍摄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等影片，更清楚地显示了其电影观念和美学风格。

仅从上述两个例子，我们就不难看出儒家文化影响的深广。因此，儒家文化和中国电影的关系确实值得深入研究。当然，儒家文化除了积极的影响之外，也有一些消极的影响，如过分强化了电影与政治的关系，而忽略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所具有的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娱乐功能等。对此，也需要进行认真的总结探讨。关于儒家文化和中国电影的关系，虽然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过一些研究，但还缺少系统、深入的科研成果。

尹晓丽在硕士阶段学习和研究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因而对儒家文化的典籍较熟悉，且有一定的学术积累。进入复旦大学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后，她又选择了中国电影作为研究方向。由于她学习刻苦努力，所以很快就进入了新的研究领域，不仅熟悉了电影学的基本理论，而且对中国电影发展史和各个历史阶段的经典影片及主要编导的创作状况也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为此，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就力图把两个学科领域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做一些富有新意的探索和研究。显然，这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是值得提倡的。她与我商讨以后，确定了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为《儒家文化传统与中国电影民族品性的构成》，其意就在于着重考察儒家文化对中国大陆电影在题材、主题、风格、思潮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凸显儒家文化的正负效应对中国电影民族品性构成的显在支配力量和潜在渗透话语。应该说，该选题是有新意和价值的。她在论文中注重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文学、电影学、心理学等相关理论，较细致、深入地论析了中国电影和儒家文化之间的历史渊源和精神联系，具体考察了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文化语境中，儒家文化传统如何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电影的发展，并探讨了中国电影所蕴涵的儒家文化理念之优长与弊端，由此揭示出电影创作者对儒家文化理念之明显的或潜在的呼应与反拨。同时，还能从全球化语境下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双重困境和跨文化语境

中儒家文化资源在电影中的重构转化两个方面，具体探讨了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儒家文化对中国电影民族性建构的意义与途径。

从总体上来看，该论文试图打破历时性的研究框架，而着重以儒家文化的主要理念来对中国电影进行文化考察，由此既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电影创作发展演变之轨迹，又评析了某些文化元素的共时性意义。同时，该论文还能在较宏观的理论视野中融入对具体作品的细读与分析，使之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由于论文观点明确、内容充实、结构清晰、论述详尽，且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因而在论文评阅和答辩时受到了各方面专家学者的好评。为使论文更加完善，尹晓丽在出版之前又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显示出严谨的治学态度。

尹晓丽在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习任务后，又进入浙江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两年来，她在科研上又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她深知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故而在认真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始终在科研上不断确立新目标，积极进取，大胆探索，并时有新作发表，这是令人赞赏的。同时，我也相信她会持之以恒，在教学和科研等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在她的博士论文正式出版之时，匆匆写下以上的话语作为序言，既表示祝贺，也以此作为勉励。

2009年8月于复旦园

目 录

绪 论 (1)

上 编 儒家传统的道德教化理念与中国电影的文化形态

第一章 道德理想主义与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特质 (21)

 第一节 民族危机与道德重建的影像诉求 (22)

 第二节 新中国电影中的道德净化倾向与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的道德多元主题 (30)

 第三节 中国电影中的性爱伦理批判与类型电影的
 道德意识 (36)

第二章 入世批判精神与中国电影的忧患救世主题 (41)

 第一节 儒家人世理念与忧患意识的文化意蕴 (41)

 第二节 忧患入世理念与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精神的
 百年传承 (42)

第三章 儒家载道文艺观与中国电影的政治话语 (50)

 第一节 儒家艺术教化观念的构成与影响 (50)

 第二节 教化主题在中国百年电影中的历史变迁 (52)

 第三节 中国电影中儒家载道观念与政治权力话语的共生 ... (57)

第四章 儒家理想人格与主旋律影片中的人物谱系 (68)

第一节 儒家理想人格内涵与“十七年”影片中的革命

英雄主义 (68)

第二节 “主旋律”影片中人物形象的儒家特质 (70)

中 编 血缘观念中的家庭伦理片与乡土意识中的电影审美倾向**第五章 家庭伦理片与中国历史文化的象征性建构 (87)**

第一节 中国家庭伦理文化的历史溯源 (87)

第二节 家庭伦理类型片的确立与发展 (89)

第三节 家国同构文化理念与中国电影的历史感表达 (92)

第六章 孝悌观念与中国电影家庭伦理片的文化形态 (97)

第一节 儒家孝悌伦理观的形成与文化价值 (97)

第二节 中国现代电影中的孝悌主题的生发演变 (99)

第三节 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对孝悌观的审视与呈现 (107)

第七章 中国电影中父子关系的儒学意蕴 (113)

第一节 儒家伦理中父子关系的文化意蕴 (113)

第二节 早期电影中的父亲形象与父子关系的伦理立场 (114)

 第三节 “十七年”电影中的父子模式与新时期以来电影中的
多元父子命题 (122)**第八章 意识形态话语与伦理法则的冲突与共鸣 (134)**

第一节 血亲复仇意识与中国电影的革命战争主题 (134)

第二节 家庭伦理情感与政治群体利益观念的整合 (137)

第三节 爱情伦理与意识形态话语的整合 (142)

第九章 儒家文化中的乡土观念与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 (147)

第一节 乡土意识与中国电影的还乡主题变奏 (147)

第二节 温柔敦厚理念与中国电影的诗化风格 (153)

下 编 儒家传统的负面影响与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

第十章 文化守成与中国电影的社会变革命题	(163)
第一节 守旧意识批判与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	(164)
第二节 宗法人治观念与现代法治的冲突	(172)
第三节 中国电影中的民俗景观与儒家文化反思	(177)
第十一章 女性命运的苦难表述与中国电影的反封建立意	(183)
第一节 儒家纲常伦理的历史演变与中国传统女性的 生命困境	(183)
第二节 伦理束缚与中国电影中女性的婚恋悲剧	(185)
第三节 贞节观的影像批判与性张力下女性的悲情突围	(193)
第四节 从子意识与慈母形象的深层隐痛	(205)
第十二章 传统伦理语境中的女性创业悲剧	(209)
第一节 早期电影中的职业女性悲剧	(209)
第二节 新时期以来电影中的女性创业悲剧	(212)
第三节 从反封建到女性主义话语的影像转型	(214)
第十三章 中庸人格与中国电影主体意识的高扬	(216)
第一节 中庸人格的文化特征与中国电影的国民性批判	(216)
第二节 寻根话语与中国电影中主体人格的理想建构	(221)
第三节 少数民族文化观照下的自然人性与独立人格	(227)
第十四章 世界电影格局与儒家文化精神的重纳转化	(230)
第一节 全球化语境下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双重困境	(230)
第二节 跨文化语境下儒家传统资源在中国电影中的重构 ...	(237)
结 语	(248)
论文涉及的中国电影名录	(251)
参考文献	(257)
后 记	(266)

绪 论

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注定会有许多历史性的时刻，一个多世纪前的1895年12月28日，当年轻的路易·卢米埃尔兄弟颇为偶然地选择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那个地下大咖啡馆放映他们拍摄的“活动照片”时，也许没有想到，这个日子连同幕布上那些朴素的工厂大门、可爱的进餐婴儿、呼啸的火车共同见证了在20世纪渐领风骚的一门新兴艺术门类——电影的诞生。值得庆幸的是，在众多舶来的艺术类型中，中国电影诞生所直面的选择焦虑和茫然没有巨大的时空历史隔绝地带，它可以在与世界电影平行的建构和尝试中，打造契合中国观众审美期待的光影王国。

令人略感遗憾的是，我们的史料中没有记载中国电影诞生的确切日期，只知道它属于1905年意味深长的一天。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科举制度被废除的“1905”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①对于本书将要阐述的内容而言，1905年最重要的事件是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景丰痛感外国影片独霸中国，会同摄影师刘仲伦拍摄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具有中国风格和艺术魅力的电影《定军山》。当一个世纪后的电影人用《西洋镜》和《定军山》两部电影来纪念那一历史瞬间时，人们发现，尽管使用的是洋人的摄影器材，但中国电影的开端没有始于喧闹的人群和滑稽的小丑，而是因缘际会地渗透着中华文化艺术的传统审美要素，电影史家非常看重此举的象征意义：

^①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陶骅等译，6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中国人自己一开始拍摄电影就与本民族的文化艺术联姻，无论如何是一种积极的历史现象。新兴的外来艺术形式，在民族传统艺术中汲取生长的营养和依傍的力量，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①“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给予营业上和文化上的支持的谋求。”^②也许从电影艺术的发展角度而言，囿于技术和经验的匮乏，取自京剧舞台造型的《定军山》还没能创造出多少引领后人的光影革新，但谭鑫培塑造的老将黄忠的银幕形象却以其忠义侠胆的儒家担当情怀，悄悄打通了中国民族电影的一条无法割裂的文化精神血脉。

“在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上、意识形态上、风俗习惯上，儒家印痕到处可见。”^③作为曾经统领中国文化格局的核心思想力量，儒学自孔子立说游学授业之日起，虽然不同程度地经受各个时代的本土学说和外来思想的冲击，但历经各代学者的阐发拓展融合，逐渐构成中国社会蔚为大观、意旨多元的，指向经典哲学、执政之道和日常规范的主流文化。不管是孔孟之道，还是程朱之学，抑或是力主融汇西方文化而思忖儒学复兴的新儒家，都力图弘扬儒家精神中的以“仁”为本的忠恕之道、博施济众的品德、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矢志于道的追求精神以及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勇气和胆识、利群思和的群体观念，更看重人伦亲情、孝悌友信的生命情怀。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所倡导的直面现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世精神和忧患意识更是在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文化背景中通过话语转换，形成同质异形的民族性价值取向。当然儒家文化中被不断强化、规范化以至官方化、专制化的尊卑等级秩序、贞烈观念、保守意识等文化压抑性元素，近代以来也不断受到抨击，这也构成日后百年中国电影反封建的一个重要精神命题。同其他文学艺术一样，在中国电影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始终不曾退隐，它的正面价值和负面效应总能催发中国几代电影人的创作冲动，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正面和负面价值的交叉重叠地带，那种随着现代文明的演进而日益模糊难辨的儒家价值观和伦理情感，更是在银幕上散发出独有的东方神韵和民族品性。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源头出发探讨电影的民族品性，是中国电影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探求电影文化形态的历史沿革与当代走向的有效入口。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论述，下面就本书的论题关键词——文化、

^① 弘石：《任庆泰与首批国产片考评》，载《电影艺术》，1992(2)。

^② 陆弘石：《中国电影：描述与阐述》，3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

^③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298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传统、儒家文化传统的精神内核、中国电影民族品格形态等主要概念以及研究思路等问题做一简要阐述。

一、文化传统的积淀与儒学核心精神的影像传承

在《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罗伯特·C·艾伦与道格拉斯·戈梅里把电影史的研究划分为技术、经济、社会和美学四个范畴。两位学者指出，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的历史的电影史，“解释”一桩电影史事件就意味着需要具体说明电影各方面（经济的、美术的、技术的和文化的）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他系统（政治、国家经济、其他大众传播媒介、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① 安东·凯斯也强调：“作为大批话语和学科的综合场所，作为相互交叉的声音的中心点，电影在当代文化史上占有一个中心地位。”^② 在文化对话交流日益频繁的全球化语境中，文化的征候性价值对第三世界国家电影创作而言尤为引人注目，因而从文化层面考察一国的电影发展是电影史研究的重要命题。电影艺术的发展演变与其所隶属的文化传统模式以及当下文化思潮的走向息息相关。后者的影响显而易见，而前者的潜在渗透则会随着不同历史时期艺术家的思想立场、时代主流文化的引导等因素的绞缠呈现出相当的隐蔽性。

同其他学科许多基础概念一样，“文化”概念也有一个从古典到当代、从混沌到澄明、从指意褊狭到内涵、外延得到深广度开拓的漫长发展和反复冶锻的历程。当代世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据统计已有 260 余种之多。^③ 其中，美国文化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对“文化”的概括较为经典，他们认为：“文化由外层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做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的行为的决定因素。”^④ 这一综合性定义确定了文化的符号传递方式和其历史传统的构成核心，并强调了其动态的过程性，既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又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某种要素。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有“文化”的字样。“文”与“化”合用，始见于《易·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

^① [美]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李迅译，280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

^② 转引自张英进：《审视中国》，13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③ 金元浦主编：《中国文化概论》，255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④ 傅铿：《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天文与人文相对，天文是指天道自然，人文是指社会人伦，即人伦仪则、道德规范以及使“民众”开化和文明化的活动。治国者必须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以明耕作渔猎之时序；又必须把握现时社会中的人伦秩序，以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级关系，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礼仪，并由此而推及天下，以成“大化”。^① 显然，“文”“化”最初便具有明确的文明教化之义。这种教化的实现离不开各种方式的文化传播途径，儒家文化的传承除了一定的物质媒介和教育道统的弘扬外，浸淫其中的人们的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和家训族规也是重要的传播方式。其中，文学艺术的文化传播功能更是在中国文化史演化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电影艺术的出现也是一次人类文化传播方式的变化，电影作为一种能记录、保存、传播信息和文化的重要手段，同样承当了人类文明史上语言文字所曾经起到过的作用。正如苏联著名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一书中所感发的那样：“每一种艺术都有自己极其诗意的意涵，电影亦不例外。它有自己独特的角色和命运——它的诞生是为了要表达生命中某一特定领域，其意义至今仍未在他种艺术中得到表达。”^②电影艺术不仅主要是反映本民族社会生活的艺术作品，而且是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形象化的集中表现。可以说，现代电影艺术不再是消极的人类回忆或思考的载体，而是以强大的影响力和权威的叙事话语重构着民众的记忆，参与着人类从古希腊时起就锲而不舍的“认识你自己”的艰难探索历程。在一定程度上，色彩斑斓的银幕世界与现实人生世界构成了一种平行的、共生互现的，或镜像式或隐喻、寓言式的想象关系。“一部电影艺术史，也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象史和心灵成长史。”^③我们可以通过电影认识一个国家、民族或显或隐的人文品性与文化精神，窥见其“心灵史”的历程。它是大众的梦幻和欲望的表达方式，是人类通过镜像方式确认自己、发现自己的独特方式。正因如此，对中国电影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学术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一方面因文化底蕴的差异而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同时又因其传播的大众性和普遍性而对演绎的文化精神起到宣传

① 金元浦主编：《中国文化概论》，3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② [苏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8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③ 黄会林、彭吉象、张同道主编：《电影艺术导论》，364页，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3。

和加强的作用。电影等视觉艺术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使用的表意符号具有世界通用性，比起文字符号来更容易跨文化交流，因而人们常常通过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电影、电视等视觉艺术作品，来直观地了解和认识这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形象地感受和体验这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与文化。这一点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之时的文化建构所引发的争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 1993 年前后，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的作品先后在权威性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国际影坛的“中国电影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想象性建构。中国新电影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重构，且不论这些电影呈现出的东方镜像的优劣真伪，中国电影，尤其是第五代导演的作品让走向世界的中国文明有了更为具体的形象展露。

作为有“世界语言”美誉的电影艺术，它所依托的镜头画面相对于文字语言更具有各民族沟通鉴赏的一致性，因此，电影艺术和其他叙事性艺术相比，更容易体现民族即世界的文化交流原则。但这种交流和影响在目前的经济和文化格局中还不免是一种不平衡的互动，好莱坞的商业运作模式和营销手段极大地发挥了电影的商品性特征，但它并不能全然保证电影作为艺术品的恒久价值。此外，世界电影文化的差异性依然广泛存在，题材上的化用和技术手段上的仿真不会彻底取代作品最终完成时的价值认同。在取材自中国古代著名的木兰从军故事的迪斯尼大片《花木兰》中，那个我们熟悉的因“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而日夜叹息，并终于“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的孝顺勇敢的美丽少女，那个因“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的思乡少女，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因嫁不出去才赌气离家出走、另寻自我价值实现的男人婆。“孝”的主题演化成自我奋斗的美国精神。而在由香港电影《无间道》改编的 2006 年奥斯卡获奖影片《无间道风云》中，警察局卧底杀死黑帮老大时的台词表现出的是西方文化中的弑父心理，而非港版中想做好人的自我救赎。《无间道》中源自佛经的对生命连绵苦楚的觉悟在《无间道风云》中被置换成为西化的人性自由的诉求。与此相似，广获好评的《疯狂的石头》尽管在情节和剪辑上有国外电影的痕迹，但其展露的社会世俗空间和地域文化品格只能在内地观众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期待中得到认同，内地和香港的巨大票房差异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精神层面上考察，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象征体系；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正如兰德曼在他的《哲学人类学》

中所说：人的行为是受人们已经获得的文化所支配的。人如何养育和繁衍，如何穿着和居住，如何实践地和伦理地行动，如何说话和看待世界——人所利用的一切文化形式，都以历史上的创造为基础。”^①庞朴则认为：“传统就是各种文化类型里面的基本核心，或核心精神……简单地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所谓民族精神，可以理解为这个民族文化的传统。”^②而传统文化则是指由历史沿袭而来的思想、艺术、制度、道德、风俗、器物、生活方式等一切物质和精神文化现象的有机复合系统。其中包含着有形的物质文化，但更多地体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心理特征上。后者是无形的，但却比前者具有更大的惰性。所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主要是指思想意识、观念形态的冲突，也就是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冲突。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体系架构中，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和现实作用构成了这个体系中的主流和支柱性结构。与其他哲学的学说意旨和现实指向比较而言，儒学的合理性和落后性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整体特征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最为突出。儒学与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具有非常深刻的同构关系，儒学被认为是理论形态的中华民族心理，而中华民族心理则是生命形态的儒学。牟钟鉴先生曾指出：“儒学植根于民族心理深层结构，仅从政治和学术的显要层面上取消它，远不足以摧毁它，它有相当一部分已渗入骨髓、溶入血液，在民族感情的催化下，便会随机萌生复发。”^③因为中华民族的任何成员，无论其对于儒学的自觉认同程度如何，“其道德信条、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族群意识等最终都与集中体现民族传统的儒学相侔互匹。传统社会中百家诸子、黄冠缁衣、隐逸狂士、村夫野老之伦无须深论，浸淫于儒家大小传统以及黏滞于传统惯性的精英与大众亦不待言；即如近现代力主西化而破斥儒家传统的维新人物、‘五四’领袖乃至后‘五四’自由主义斗士，其思想观念或精神气质中的儒家成分也显而易见。”^④而这些人物几乎少有例外地或迟或早、不同程度地回归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这也并不是所谓“倒退”“反动”一类社会政治观念上的问题，而具有深刻的文化传统——心理素质

^① [德]米夏埃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张乐天译，227页、22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② 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122页，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③ 郑家栋、叶海烟：《新儒家评论》，第1辑，37页，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94。

^④ 胡治洪：《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26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方面的原因。

那么儒家文化传统的核心精神包括哪些内容，这些理念对于中国百年电影创作理念和风格呈现发挥了哪些塑造功能？进而与中国电影民族品性哪些方面的特征息息相关，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在展开正文前予以阐明厘清。儒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哲学体系，如果不在概念上有所分疏，根本不可能做出有意义的讨论。刘述先认为有三种意义上的儒家。

(1) 精神的儒家，指孔孟、程朱、陆王的大传统，也是当代新儒家通过创造性的阐扬与改造力求复兴的传统。

(2) 政治化的儒家，指由汉代董仲舒、班固以来发展成为朝廷义理的传统，以纲常为主，但也杂入了道家、法家以及阴阳家的因素。

(3) 民间的儒家，这是在“草根”层面依然发生作用的信仰与习惯，重视家庭、教育的价值，维持勤劳、节俭的生活方式，杂以道教、佛教的影响，乃至鬼神的迷信。^①而中国电影中的儒家文化形态事实上也正是由这三个层面的思想内容凝结而成。中国电影的人文精神和影戏理念及其杂糅的意识形态话语都不同程度的与这三种形态的儒学发生关联。

《中国文化概论》一书将儒家文化传统的核心精神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担负历史责任、注重整体利益；二是崇尚气节、正道宜行；三是求是务实、自强不息；四是讲求道义、关心他人；五是圆和持中，宽忍平和；六是豁达乐观，以道制欲。^②而就儒学正面的民族性功能而言，可以说正是儒学的入世意识、家国意识、道德意识、自律意识等文化观念熔铸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魂魄。

入世情怀是使儒学具有民族精神熔铸功能的重要文化意识。道家求遁世，佛教尚出世，而儒家则始终倡导积极的入世价值观。孔孟的言行处处洋溢着昂扬的入世情怀。《大学》则将孔子的入世意识具体化为“三纲”和“八目”的行动纲领。“三纲”即所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则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所倡导的入世意识虽然以入仕为目标，但即使不能入仕，儒家也不主张消极的遁世或出世，而应当“独善其身”和“独行其道”。^③家国意识是由入世意识衍生的儒学的另一重要文化意识。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公孙丑》)可以说，在诸子百家及此后传入的

^① 刘述先：《儒家思想开拓的尝试》，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② 金元浦主编：《中国文化概论》，255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③ 童鹰：《论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二律背反——兼论新世纪中国儒学的走向》，载《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1)。

佛教等各种学说中，没有哪一家学说具有儒家如此强烈的家国意识。儒学强调个人对家庭的责任，特别是强调个人对国家的责任。“齐家治国”既是儒家的人生理想，也是儒家的行动纲领。《大学》中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正是儒学这种强烈的家国意识的精要表述。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则可以说是浓缩了儒学的家国意识特别是国家意识的至理格言。中华民族所以具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儒学的家国意识在其中所起的熔铸作用功不可没。在以左翼电影辉煌成就为代表的中国电影现实主义传统中，儒家的人世意识和家国理念是其民族文化底蕴的坐标。

道德意识是儒学有别于其他学派的重要文化意识之一。可以说，以道德本体论为基点的道德主体论、道德政治论、道德伦理论和道德自律论等道德理论在儒学中占有主导地位。儒学的所谓“内圣”之学，实为士人修身至德之学；而儒学的所谓“外王”之学，则实为仕者以德治国之学。自律意识是由道德意识和伦理意识衍生出的儒学的另一重要文化意识。儒学的内圣之学，实际上是士人的自律之学：在心灵之内，个人要严以“克己”，达到一种“止于至善”的道德境界。“它们确实不仅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精神张力，而且能成为熔铸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一个重要源泉。”^①同时也是中国电影道德教化主题构成的重要思想源泉。

当然，儒家文化的这些正面核心价值在历史演进中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异化，成为阻滞中国社会进步发展和国民思想解放的精神因素。作为诞生于封建时代的文化产物，儒家思想一直成为两千多年来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的基础。血缘与情理陶冶了中国文化的人世意向，同时，在或现实或虚幻的血缘关系中，人们可以得到人伦的实现与情感的满足，在安身立命的现世基础奠定上，它以“中庸之道”来调和激烈的矛盾，以求稳定；它以“克己复礼”来抑制人的合理欲望。它要求“以不变应万变”，守旧、保守，以静止、孤立的观点看待社会。这势必造成人们一种静态的文化心理。同时，儒家初期颇具人性价值的原则秩序在历史发展中往往蜕变成不无压抑性的社会规范，三纲五常、尤其是贞节观念等封建礼教造成了众多女性的生命悲剧。而儒家的文艺教化理念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电影对民族危亡、现实问题的批判力度；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电影注重社会宣传效应、忽视电影审美艺术的弊端产生的文化心理的根源之一。

^① 童鹰：《论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二律背反——兼论新世纪中国儒学的走向》，载《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1)。